

战争文学的生命气象

——对话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军旅作家徐怀中

■本报记者 傅强

谈艺现象

深度对话,解读现象

傅强:徐老好,首先要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您以90岁高龄,凭借长篇小说《牵风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是军旅文学的荣耀,也是当代文学的传奇。

《牵风记》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叙事文本,是一种新的审美建构和想象,是一种浪漫自由精神的张扬。这在中外战争文学中都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中国军旅文学中更是独树一帜。您是否有意识地想要打开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印证一种新的战争文学的叙事逻辑?

徐怀中:我很高兴,没想到还能获奖。追求某种新的构建,这种意图肯定是存在的。我注意到你发表在《解放军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上的两篇文章,提及“超越性写作”这个概念。我写《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先后有过两个塑料硬皮小本子,偶尔想起一个生活细节、一句有意味的话,便随手记下来。也抄写过一些古人先贤的格言,及有关文学创作的一些名家语录,用以激励自己。其中便记录下了爱默生的这样一段话:“太阳白白照亮了成年人的眼睛,可它一直透过孩子的眼睛照亮了他们的心灵。热爱大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仍然协调一致的人,他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了孩童般的纯真。”整个写作过程,爱默生的这段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

傅强:您愿意于这样的超越性写作,并非始自《牵风记》。1999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您的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2000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又发表了您的短篇小说《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小说自然平淡到极点,这些作品都是在为这部集大成之作《牵风记》做准备吧?

徐怀中:集大成之作不敢当,但写那两个短篇,确实是为十多年以后才姗姗来迟的这部长篇小说打了一个前哨战。《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标题下,引用了一段隐喻式的人生格言,在《牵风记》里又重复使用,成为引领全篇寓意的一个极具关键性的线索。《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中,那个小女孩的“一抹极淡极淡的微笑”,被原封原样复制了下来,便是《牵风记》中北平女学生汪可逾脸上总带出的那个“标志性的微笑”。小说开篇,正是由这样的一个匪夷所思的生活细节切入,无形中为情节的展开带来了一层空幻的神秘感。

傅强:综观您各个时期的创作,始终葆有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创新意识,即使在纪实性作品《底色》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这种文学气质在当下中国文学中凸显着一种先锋色彩。假设把您归入先锋作家的行列,您能接受吗?

徐怀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创新求变曾令我振奋。遗憾的是,先锋作家的锋芒不能为我借用。我欲再度开发自己,至关紧要的是彻底消解自我

禁锢的意识,清除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真正回归到文学艺术固有的规律上来,枯树才有望生发新叶。你居然设想,将我列入先锋文学阵营,令我有些猝不及防。有评论家指称《牵风记》是“国风”式的书写,一下回溯到《诗经》,几乎是中国文学传统长河最为古远的源头。现在却又多承你的美意,认为这样的本土化写作,完全可以与先锋文学画等号。那么好了,分明是背向进发的两列轨道车,岂不成了殊途同归吗?

傅强:齐白石衰年变法,您90岁写出一部具有崭新审美观念与文体风格的《牵风记》,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促使您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动力,或者说哲学依据是什么?

徐怀中:随野战军挺进大别山这段经历,是我写作生涯中至为珍贵的一个题材。我暗自发誓,不把它团弄到完全满意的地步,宁可窝在手里,也不拿出去。正如你所说,历经沧桑风风雨雨,跨越世纪门槛,一路蹉跎过来了。我不再瞻前顾后,最后关头,必须完全放开手脚作最后一击。希望能以一副全新面孔示人,如一只鸟儿独立枝头,避免与任何人雷同。其实,所谓独创性够几分成色,无明确界限,只在读者心中。话又要说回来,《牵风记》意在凭借自己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战争背景最大限度地被隐没被淡化了,小船拨转头来,驶入了亦真亦幻的另一重天地。小说的文体风格,自然而然与诗歌——最早产生的这种古色古香的文体裁相契合。适宜如诗歌艺术那样无限开拓想象空间,充分发挥抒情性,以至于汲取诗歌声调韵律的醇美与韵致。

傅强:《牵风记》的故事并不复杂,矛盾冲突谈不上多么激烈而跌宕,字数亦不算多,却写出了大海般辽阔辽远的感觉,显露出硕大丰沛的精神容量。您是在寻求一种史诗性的效果?

徐怀中:我是在战争交响乐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文韬武略马革裹尸,那种无可替代的炽烈的艺术魅力,时时在吸引着我,何尝不想写出一部概括性极强的大部头战争小说呢!但我未曾给自己设定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伟大目标,那样怕只能是害害自己了。但就我的写作心态而言,却又不肯屈服就现状,不肯向文学艺术时尚化妥协退让,时常处于一种心有不甘的情绪之中。仿佛一个建制部队,因为未能达成战斗任务不得不退出战场,以至于被取消了番号,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心境年轻一辈人能否理解?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爬行者的足迹》,感叹自己写作的艰辛与无奈。从初学至今,不过是薄薄几本小书,哪怕是几千字的一个短篇,也都写得很难。徒劳抱有毕生梦想,未可于海阔天空自由翱翔一番。回首看去,一切都来不及了,你已经是风烛残年之人了!

傅强:《牵风记》是一个很奇特的文本,一方面奇崛玄幻,深邃高蹈;另一方面又写得真实很真。亲身经历加出色的记忆力,使得您在复现和描写历史

场景与生活细节时游刃有余、绵密入微。在我看来,您在细节真实上下这样大功夫,最终都是为小说整体上“虚”的那一面服务的。也就是说,您并非要还原真实的历史时空,而是要建构一个超越前人的独特的文学世界。

徐怀中:是这样的,我的用意正在于此。就整体而论,小说寓意趋向于空幻悠远,采用了泼墨大写意手法。而细节处理,则是尊崇工笔细描。蝓蝓儿的两根长须、蝉翼的超薄透明,原生复制制下来,一点不走样。生活细节与具体情节描写的充沛与坚实,便为物象塑造的丰满与鲜活奠定了深厚基础,进而从人物各自的生命体验中超拔出来,期望上升到哲学思考的高度。不妨说,这也正是从微观世界到宏观层面,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彼此呼应,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有读者反映说,小说虽多有匪夷所思处,却给人感觉上完全是真实的,并不质疑是源自于艺术虚构。由于提高到自觉意识上来,《牵风记》许多细节写作,屡屡获得了内心的愉悦和满足感,这在我以往的创作中是很少有的。

傅强:《牵风记》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处处凸显文化力量,亦将文化的魅力烘托到了极致。您如何看待战争中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形象设定是否想要传达一种启蒙的思想和精神?

徐怀中:“七七事变”以后,大量知识分子如百鸟朝凤,从大后方各地会聚于延安宝塔山及各大战区前线,以自己一腔热血,为服务战争与根据地建设作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我在太行山中读书时,从校长到所有男女教师,都是从北平、上海、南京、重庆来的。我所在的第二

野战军总部及各纵队宣传部长,大多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解放战争末期,又有大批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洪流中来,为新中国开国大业准备了雄厚的人才队伍。这种情况令我感触很深,所以对我而言,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军事文学作品中应该占据一定地位,是自不待言的。

不过,《牵风记》酝酿及写作过程中,主观上我并未刻意要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地位。我只是在战地生活的彩云流变之间,撷取了几株个体生命的标本——两男一女,以及有着500万年“记忆”力的一匹老军马。这四株生命形象在我心目中并无孰轻孰重,也无高下之别,我甚至不在意区分开来其中哪一株属于人类,哪一株原属于动物。

傅强:小说中多次描写汪可逾弹奏古琴,给在场者留下了刻骨铭心、超越时空的记忆。其实,震撼人心的不是外在的旋律,而是这种音乐存在对心灵的冲击。您在描写弹奏古琴的段落时,内心听觉响起的是什么样的音乐?

徐怀中:《琴赋》的作者嵇康讲:“在我看来,万物都有盛衰,唯音声不变(译文)。”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先人削桐为琴绳丝为弦,所制作出的第一张古琴,弹奏出的第一个单音,至今还应该是原本原样存在的。汪可逾一生梦想所追求的,正是逆时针回返历史的原点,听到这个世界上最初发出的一声古琴空弦音。古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别光彩的符号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是塑造汪可逾艺术形象不可或缺的要害之一。同时,我也借用这件古老乐器的大美之音,不断延伸与强化了小说的主题内涵。



青春风景(中国画)

何晓云作

“现象级”写作

■李国平

徐怀中九十高龄创作的《牵风记》,对个人来说,应该是晚期创作,但这部作品孕育着诸多信息和启示,对当下的文学语境乃至新时代的文学创作,都将产生示范性的影响。《牵风记》堪称“现象级”的文本,蕴含着许多超越作品本身、超越军事文学的意义。

徐怀中这样的作家,现在不多了。他经历过枪林弹雨,是革命战争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者。《牵风记》创作的依据就是徐怀中亲历“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历经生死考验,沉淀下来的宝贵素材”。

对《牵风记》的解读,当然要基于革命战争的大背景,这是战争的史诗、生命的史诗。另一个层面,小说彰显的是美的光辉,是对人性的礼赞,是普通与平凡、坚强和脆弱,甚至是敏感与感伤。小说的主人公兼具军人的意志和艺术家的气质,徐怀中塑造了“大写”的人,打开了元气淋漓的生命气象。这个“大写”的人,恰恰包含着人的全面发展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从历史绵延到当下,从宏阔的思想主题到幽微的人性空间,《牵风记》有着巨大的言说空间。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牵风记》并不是三部曲式的百万字的、长河式的大部头小说,而是一部精致而有大局、大

美学、大气象的长篇小说。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用去了作者将近六十年的时光。精雕细琢,呕心沥血,厚积薄发、沉潜稳重的文学品格,并不单纯是一个艺术技巧的问题,而是创作态度的问题。更进一步说,牵涉到的是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写作伦理。这些问题又紧接着时代的变革,关乎人们对文学理解的深化与提升。

徐怀中创作《牵风记》,历时近六十年,经历了三次否定。第一次否定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如果那个时候徐怀中拿出《牵风记》,也应该是那个时代的独异之作、上乘之作。但是,因为政治运动而遭受被动的否定;第二次否定则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徐怀中创作《西线无战事》之前。改革开放之后,徐怀中重新开始《牵风记》的创作,“几次动笔又几次辍笔,写不下去”,发生了否定。这一次否定则是主动的,源于整个社会精神认知的促动,源于个人文学认识的变化,这个变化又是整个新时期文学认识深化的结果。

徐怀中对于自己创作的思考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现象同步发生,既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又有着个人的深切体验。他一定意识到了诸如公式化、模式

化、脸谱化,甚至空泛空洞的弊病,他已经开始思考、重启自己的生活经验,重新审视自己构筑的艺术世界。如何打开生命的空间,如何加进更多新鲜的元素,如何在现实主义底色上注入人文关怀和人性探索的深刻内容,时时敲打着徐怀中的神经。虽然不能说《西线无战事》就是他创作《牵风记》的前奏,但可以说,《西线无战事》的探索和尝试,可以看作徐怀中一个阶段的思考成果。第三次否定则发生于《牵风记》文本的完成过程中,贯穿于徐中后期写作的整个过程。这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一个逻辑过程。这一次否定,我称之为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后的升华。徐怀中的三次否定是对自己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又应和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思潮起落,映照看当代文学探索前进的轨迹,凝结着当代文学的珍贵经验,坚守和巩固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形成的优秀传统。

《牵风记》写的是什么?我无以言说。作品在写实和写意、情和理、轻与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宏大叙事和生命哲学,诸多方面都提供了了解谈的空间。它以历史为载体,突显人性的光辉,赋予人以礼赞,咏叹源自战争又独立于战争、源于人类又超越人类的生灵感应和生命奇观。《牵风记》融注了徐怀中的一生的阅历,贯彻着创作者经过否定之否定、升华而获得的文学观念,呈现出对世界、对人的更深入的理解。

《牵风记》是作家对文学创作规律透彻的觉醒,是个人的晚期创作,但又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示范、某种开始。

长征

第4614期

深度感应时代

■杨辉

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中“主角”的故事,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暂有了“了局”。其间所涉,凡四十年。四十年间,世事沧桑巨变,个人命运亦随之起落、升降、成毁、兴衰。但阶段性的“衰”与“降”,并不能指称主人公命运的整体走向。忆秦娥的生命故事包含着时代的故事。她克服种种生活与技艺修习的阶段性危机且精进不已的形象,亦属时代总体状况的表征。不仅如此,作家陈彦还有更为宏大的“野心”,“把演戏与围绕着演戏而生长出来的世俗生活,以及所牵动的社会神经,来一个混沌的裹挟与牵引”。世态、人情、物理,虽深浅不一,但皆有呈现,端的是一个盛大的人间。以《主角》所敞开的世界为典型,也可以见微知著、洞幽入微,深度观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迄今社会总体变迁的基本脉络及其意义。《主角》较为广阔的世界展开,多样

复杂的思想资源以及融通多种传统的艺术呈现,均以此为最终落脚处。

陈彦试图如柳青、路遥一般,全景式、整体性地思考人物的命运及其与时代之间的复杂关联。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忆秦娥取代前辈成为秦腔皇后,最终也需要面临被后辈取代的命运。期间其对演戏之于时代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入理解,表达着“主角”的价值担当和责任伦理的要义所在。无论身处何种领域,“主角”不仅意味着身在其中、他人无法取代的重要性,同时还意味着超越常人的付出、更为复杂的生活际遇以及必须担当的责任使命。《主角》中“主角”的寓意,因此包含着指称更多人的命运的叙事效力。

作为卓有成就的剧作家,在开始小说写作之前,陈彦有近四十年现代戏创作的丰富经验。《主角》在扎实细密的现实叙述之外,多了一层古典思想及审美的境界和

3部军队报送作品喜获“五个一工程”奖

■谭卓廷

8月19日,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揭晓,军队报送的3部作品获奖。其中,电影《古田军号》获特别奖,电影《信仰者》、歌曲《复兴的力量》获优秀作品奖。此外,军队文艺工作者独立完成或参与创作的作品,也有多部入选。如原海政电视艺术中心参与创作的《红海行动》(电影)、军

史专家刘统创作的《战上海》(图书)、军旅作家袁山创作的《雪山上的达娃》(图书)等。这些作品,是军队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主席关于文艺工作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文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积极作用而创作出的精品力作,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反响。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牵风记》等五部长篇小说获奖。这五部作品,有的写战争、家国天下、民族精神;有的写文化命脉、学问人生;有的写社会改革、历史变迁;有的写人间悲欢、人物命运。总体看,各有千秋,各有特色,都有大气象。

《人世间》和《北上》,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通过一座城市、一条河流、一个工厂、一个家庭几十年的发展变迁,表现中华民族的进步,虽然也有苦难,但还是写出了人间温暖,叙事比较扎实。《应物兄》携带丰富的学养,知识面宽,文化含量深沉,既是一部长篇小说,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儒学的普及读物,在小说结构方面也有新的探索。《主角》文风朴实,文笔老道,故事讲得细腻,着眼于底层人物的悲欢离合,同陕西作家厚重的文风一脉相承。总之,上述作品可以说代表了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军旅老作家徐怀中的《牵风记》,这部作品一开始就受到评委的广泛关注。作为一个战争亲历者,徐怀中既是军事文学创作领域的耕耘者,也是首倡“不拘一格,八面来风”的军事文学教育家,更是一个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探索者。从《我们播种爱情》(无情的情人)到《西线无战事》《底色》等,每一部作品都有鲜明的个性风格,突破传统拘囿,开风气先河。大家在讨论中了解到,《牵风记》始创于1962年,“文革”中徐老因为受到批判,《牵风记》二十七万字的书稿被销毁了,半个世纪后重新捡起来写,跟初衷相比,可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更有诗情画意了。徐老不仅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闻所未闻的新的战争体验,而且这种体验是那么深入人心,那么美好。他似乎很早就找到了军事文学创作的另一扇奥妙之门,另辟蹊径,别有洞天。作为军旅作家,徐怀中的作品是我们中间最年长的,但他的作品是我们中间最年轻的,他在不经意间打破了军事文学创作的惯性思维。

很快,对《牵风记》的肯定就形成了共识。在讨论中,一位评委说,《牵风记》是一个老作家对于文学的致敬,我们也应该对这样矢志不渝的老作家致敬。8月7日进行第三轮投票,《牵风记》以唯一的全票进入前三十,排名第一。宣布投票结果的时候,全场寂然,但是我分明听到了热烈的掌声,掌声来自评委们的心里。我认为,这不仅是对一个老作家和《牵风记》这样一部作品的致敬,也是对文学的尊重,对军事文学的理解和支持。

从始至终,《牵风记》被普遍看好。8月12日下午,《牵风记》又以票数第一进入前十。8月16日上午最终的结果揭晓,《牵风记》以并列最高票数登榜,因为评审规则的原因,票数相同,以出版时间为序排名,所以大家看到的是梁晓声的《人世间》排在第一位。

16日中午吃饭的时候,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高兴地对我说,感谢军队给我们送来这么一部好作品,感谢徐怀中心

亲历「茅奖」评选

■徐贵祥

志。我说,徐老可能还不知道获奖的情况。铁凝主席说,你可以发个信息,让老人家高兴高兴。

《牵风记》获得茅盾文学奖,确实是众望所归,它是徐怀中心志用他“颤颤巍巍的脚步,努力追随改革开放的豪迈步伐”的结果,是他“尽最大的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的结果。

历经将近二十天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终于落下帷幕。除了五部获奖作品,像党益民的《雪祭》、肖农的《穹庐》、王刚的《喀什噶尔》、卢一萍的《白山》等,或以题材宏大见长,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或以边塞生活为书写母体,书写戍边战士的胸怀境界和生活情趣,我个人都是比较欣赏的。

当了“茅奖”评委才深切地感受到,当评委和当作家、当读者是不一样的。评委的首要职责就是捍卫茅盾文学奖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经典性。

(作者系著名军旅作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